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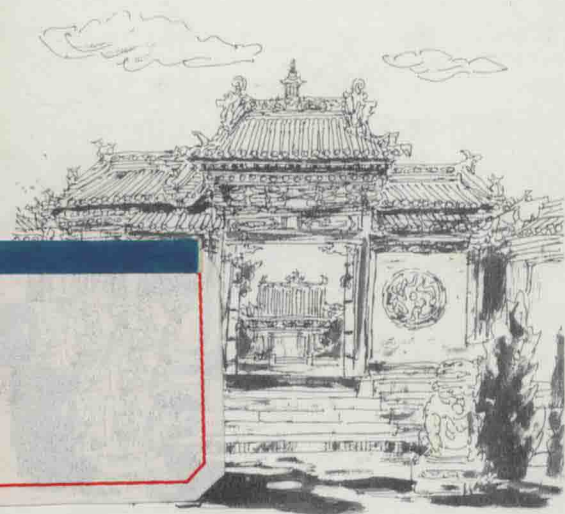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(第十三辑)

总主编/李玉明

山西道教宫观史话

杨子荣
/ 著

山西自东汉末道教产生以来，就是中国道教，特别是全真道重要活动地区之一，历代建筑了不少宫观和被道教奉祀的各种神庙建筑，最早是唐代的，金元时期的占大部分，明清也有遗存，现存的仅国保和省保单位就有百处左右，占这两建筑保护单位的百分之二十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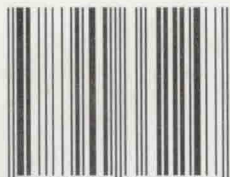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刘冬梅
韩 慄
装帧设计 冀建海
插 图 朱连威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十三辑)

- ◎ 东魏北齐与山西
- ◎ 唐玄宗与潞州
- ◎ 金末河汾诸老诗派
- ◎ 山西元杂剧作家
- ◎ 元代诗杰萨都剌
- ◎ 北宋名臣毕士安与文彦博
- ◎ 丁村民宅与民俗
- ◎ 山西道教宫观史话
- ◎ 狂飙盟主高长虹
- ◎ 上党史话

ISBN 7-900362-24-X



9 787900 362247 >

ISBN 7-900362-24-X

G·11 总定价:30.00元(每册3元)

责 编:刘冬梅

韩 慄

复 审:余超英

终 审:董高怀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13辑)

山西道教宫观史话

杨子荣 著

*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-4922123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3.8125 字数:300千字

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(套)

*

ISBN 7-900362-24-x
G·11 定价:(全套10册)30.00元

《山西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 问：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
 姚奠中 侯伍杰 申维辰 张 颌

主任委员：李玉明

委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玉山	马志超	于贵卿	于崇良	王克林
王志超	王宝库	王灵善	王振芳	王家壁
牛崇辉	田中仁	冯素梅	任茂棠	刘 巩
刘在文	刘纬毅	刘振华	刘晓丽	成葆德
齐荣晋	李元庆	李东福	李锐锋	吴广隆
宋丽莉	杨二怀	杨子荣	李建峰	张国祥
张捷夫	张鸿仁	罗广德	陈长禄	胡存悌
赵曙光	郑建国	降大任	郭维明	高 可
高专诚	陶正刚	柴泽俊	秦海轩	梁俊明
谢 恺	董永刚	董占锁	董瑞山	楚 刃
雷忠勤	霍润德			

目 录

引 子	(1)
一、元以前道教建筑	(3)
二、明清道教建筑	(18)
三、道教文化源远流长	(38)

引 子

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教派组织，产生于东汉末。东汉灵帝中平元年(184)二月，河北钜鹿(今巨鹿)人张角领导农民起义(又称“黄巾起义”)。因起义军遵崇《太平经》，故称太平道起义。这是中国最早以反剥削、反压迫的农民起义为号召而出现的道教组织。接着，同年七月，汉中地区张修领导五斗米道起义，以响应张角的太平道，这是又一支同时兴起的民间道教势力。五斗米道后来投降曹操，开始在内地传播。

中国道教自东汉末叶产生以来，经魏晋南北朝成熟而定型，在隋唐达到了鼎盛时期，至宋元出现新的发展趋势，进入明清后逐渐停滞以致衰落。道教在发展过程中，始终与儒、佛二家相互影响，相互渗透，成为与它们鼎足而立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国道教宫观建筑出现最早的雏形，当时不叫宫观，而叫“治”。所谓“治”，原是五斗米道基层组织单位，一共有24治，后来发展成道教固定的宫观建筑。根据《太真科》记载，每个治“地方八十一步，法九九之数，唯升阳之气”。治的中央是一座二层建筑，下层叫“崇虚馆”，宽六间十二丈。上层中央两间是“崇玄台”，中间置大香炉，高五尺，供焚香用。台的东、西、南三面开门，门边安窗户。台两头为马道。在“崇玄台”北五丈是“崇仙堂”，面阔七间十四丈。东为“阳仙房”，西为“阴仙房”。玄台之南十二丈为五间的门室，门室西侧为典司察

气祭酒舍。治内还有一些小舍。²⁴ 治都是以上这个布局。这是中国道教最早的宫观建筑,是道教从民间秘密状态走向社会公开化和官方化的重要标志。

唐代皇帝自称是老子的后代,把老子道崇为“圣祖”,封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,道教道崇为“国教”。尤其到唐玄宗时期,道教达到了兴盛顶点,天下普建道教宫观,并全部国家供给。天宝二年(743)又追封老子为“大圣祖玄元皇帝”。过了六年,加封为“圣祖大道玄元皇帝”。又过五年,改封为“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皇帝”。自唐以后,道士居住修道的地方就正式统称为宫观了。一般是较大的道观称“宫”,较小的称“观”。

自唐代儒、释、道三教开始合流,到宋元时期,中国道教又有新的发展,至元代中叶以后,各派渐渐合归于正一道和全真道两大派,山西是全真道占主流。在明清两代的500多年间,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,中国道教受社会的影响,这一时期没有多大发展。

山西自东汉末道教产生以来,就是中国道教,特别是全真道重要活动地区之一,历代建筑了不少宫观和被道教奉祀的各种神庙建筑,现存的仅国保和省保单位就有百处左右,占这两级古建筑保护单位的23%。最早是唐代的,如芮城广仁王庙(五龙庙)、浮山老君洞等。金元时期的占大部分,重要的如芮城永乐宫,太原昊天观(龙山石窟)、平遥清虚观、汾阳太符观,绛县长春观、景云宫、泽州太平观、陵川白玉宫、高平万寿宫、离石宝峰山道观,以及东岳庙、后稷庙、三峻庙、圣母庙、五岳庙、三官庙、三王庙、二仙庙、龙王

庙、仙翁庙等。明清也有遗存，如太原纯阳宫、代县赵杲观、泽州玉皇庙、恒山建筑群、万荣后土庙、介休后土庙、汾阳后土圣母庙等。

一、元以前道教建筑

芮城广仁王庙(五龙庙)，在县城北4公里中龙泉村。因庙前有五龙泉，俗称“五龙庙”。庙内奉道教祈祀的水神，封号“广仁王”，俗称“五龙王”。据元至正五年(1345)三月《五龙神像碑》记载，宋熙宁三年(1070)五月天旱，潞州刺史刘涣“祷雨于祠，始塿(塑)五方龙像于正殿之后堂”。大观二年(1108)八月，遭雨灾危害庄稼，河东转运判官王桓祈祷晴天而显应，呈请敕赐“会应王”。五龙亦赐号，东方为“广仁”，南方为“喜降”，西方为“义济”，北方为“灵泽”，中方为“孚惠”。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，广仁王庙虽然建于唐代，但正式开始塑五龙像是在宋熙宁三年(1070)，赐号则是在大观二年(1108)。“广仁王”为东方之龙。现存的广仁王庙规模较小，仅存山门、戏台、厢房和正殿。山门位于庙的东南角，其方位和规制与山西民居习俗相同，是依据八卦定位的。八卦将东方、东南方和南方定为吉利方，而东南颳来的又是薰风，会给人们带来好运的。正殿建于唐太和五年(831)，面阔五间，进深三间，单檐歇山顶，柱头斗拱五铺作。该殿梁架、斗拱等主体构件仍为唐代原构，至为珍贵。

浮山老君洞，在县城西南5公里张庄乡梁村。始建于唐

武德二年(619),是一座纯石结构的道教建筑,无寸木片瓦。洞宽三间,高4米,面积19平方米。宋代在洞前外壁东西两侧镶嵌“太上感应篇”石碣多方;元代在洞内四壁布满壁画;明代嘉靖年间(1522—1566)增修后,用39块青石线刻老子八十一化图像,每幅并有文字说明,镶嵌于洞的左右两壁。该洞集唐、宋、元、明四朝文化,是研究山西道教建筑、壁画、雕刻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老子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,道教奉为教主。姓李、名耳,字伯阳,谥号聃,楚国苦县(今河南鹿邑东)历乡曲仁里人。据说曾任东周守藏室之史(管图书的史官),后因周室内乱,去官过函谷关(位于今河南灵宝市境内),关令尹喜请为著书,遂作《老子五千文》(即《道德经》)。道教在形成过程中,利用老子的威信及其学术中有关“道”和“自然无为”、“生长久视”等内容加以附会引伸,把“道”作为根本的信仰和制订教理教义的依据,称其为“道教”,尊老子为三清之一“道德天尊”。“道教”一名,最早出现在《老子想尔注》(《道德经注释》),清末在敦煌发现该书六朝抄本残卷。另外,据传说老子生于殷武丁九年二月十五日,后世道观于此日作道场,诵《道德真经》以为纪念。

永乐宫,原名大纯阳万寿宫,因位于原永济县永乐镇,俗称永乐宫。永乐镇是道教全真道五祖之一吕洞宾的故里,唐末吕氏死后,乡人将其故居改为“吕公祠”。吕洞宾,唐末道士。名喆(或严),号纯阳子,自称回道人,河中府永乐县(现山西芮城县)人。相传咸通三年(862)64岁进士及第。后游长安,遇钟离权,经过“十试”,乃授以“大道天遁剑法,龙

虎金丹秘文”。其理论以慈悲度世为成道路径，改丹铅与黄白之术为内功，改剑术为断除贪嗔、爱欲和烦恼的智慧，对北宋道教教理的发展有一定影响。元代封为“纯阳演政警化孚佑帝君”。自北宋以来，民间传说其故事相继出现。著作真伪混杂，苗善时收编为《纯阳帝君神化妙通记》七卷。相传吕洞宾出生于阴历四月十四日，后世道观于每年此日要举办斋醮，以志纪念。金末，随着吕洞宾神话故事的流传，奉祀者逐渐增多，祠堂遂扩充为道观。蒙古太宗乃马真后三年（1244），道观被火焚毁。此时恰逢新道教全真派首领邱处机等人倍受元廷宠信，祖师吕洞宾更受人尊崇，次年敕令“升观为宫”，并在原址上开始了兴建大纯阳万寿宫的浩大工程。工程由河东南北两路道教提点潘德冲主持。潘德冲（？—1256），字冲和，道号微妙真人，淄之齐东（今山东淄博市）人。曾和宋德芳同随邱处机谒见成吉思汗。卒于蒙古宪宗六年（1256），世祖中统元年（1260）安葬永乐宫峨嵋岭，并建有吕公祠。到中统三年（1262）永乐宫建成了三清殿、纯阳殿、重阳殿；至元三十一年（1294）建成龙虎殿；泰定二年（1325）绘三清殿壁画；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绘完纯阳殿壁画。至此，营建工程告一段落，历时110年，几乎与元朝共始终。龙虎殿，又名无极门，是永乐宫原来的宫门。三清殿，又名无极殿，祀玉清、太清、上清，是道教崇奉的最高神。殿内满绘壁画《朝元图》。纯阳殿，又名混成殿，祀吕洞宾。殿内绘吕洞宾游化故事52幅。重阳殿，又名七真殿，祀全真道七位祖师。殿内绘王重阳游化故事壁画49幅。明、清两代虽曾进行维修补葺，但整个元代建筑的布局、结构形制基本未变，完

整地保存至今。1958年，黄河三门峡水库动工兴建，永乐宫地处淹没区，为了有效保护这组珍贵的元代宫观建筑，经国家批准，包括1000多平方米元代道教壁画在内的全部建筑完整地迁建于芮城县城北2.5公里龙泉村，即今址。

永乐宫为元代道教全真道三大道观之一。全真道亦称全真教、全真派，与正一道同为元以后道教两大派。金世宗大定七年(1167)王重阳于山东宁海(今牟平)全真庵聚徒讲道时创立。王重阳，原名中孚，字允卿。后应武举，易名德威，字世雄。入道后改名王喆，字知明，号重阳子。陕西咸阳人。传说于甘河镇(今陕西户县境)遇仙人吕洞宾的化身，得修炼秘诀，遂通仙术。于是弃妻离子，云游终南山一带。大定元年(1161)在南时村作穴墓居之，名“活死人墓”。后往山东崑崙山(今山东牟平县东南)，马钰、孙不二夫妇筑庵事之，题号“全真”，由是凡宗其道者，皆号全真道士。他主张儒、释、道三教合流，出家修真，不炼外丹。大定九年(1169)在返回陕西传教途中死亡。元至元六年(1269)追封为“重阳全真开化真君”，至大三年(1310)封为“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”。著有《重阳全真集》《重阳教化集》《立教十五论》等。

王重阳生前收有七大弟子，即马钰、谭处端、刘处玄、邱处机、王处一、郝大通、孙不二，称为“北方七真”。全真道真正进入全盛时期是邱处机担任教主以后。邱处机，字通密，号长春子，登州栖霞(今山东栖霞县)人。19岁拜王重阳为师，后继刘处玄成为全真道掌教人。大定二十八年(1188)，金世宗曾召邱处机进京问道。当蒙古族崛起，同金代和南宋争夺中原时，三方都把他作为争取的重要目标，最后他选择

了蒙古。当时远在西域进行征战的成吉思汗派侍臣刘仲禄来召见，邱处机以73岁高龄，率领18个弟子跋涉数万里，远赴中亚撒马尔罕成吉思汗的行营去见这位蒙古最高统治者。邱处机劝成吉思汗敬天、爱民、戒杀，奉行清静无为之道，博得这位蒙古大汗的欢心，被尊为“邱神仙”，派他掌管天下道教，并免除全真道一切赋税。

全真道得到了蒙古给予自由建宫观和广收道徒的权力，全真道的扩展迅速发展。永乐宫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大规模修建并“升观为宫”的。元统一中国后，全真道传遍大江南北，达到兴盛时期。全真道解释其教名“全真”时说，“全真”就是保全“真性”的意思。

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，为表明其道统源远流长，又尊王玄甫、钟离权、吕洞宾、刘操为祖师，连同他号称“北五祖”。元至大三年(1310)赠封他们为帝君。王玄甫，道教神仙。号东华子，又号东华帝君或紫府少阳君。全真道“北五祖”的第一祖。称为汉代人。又称为春秋人，名李亚。先居崑崙山烟霞洞，“后徙居代州五台之阳，山中今有紫府洞天，山下有道人县。”后传其道于正阳真人钟离权。钟离权，亦称“汉钟离”。传说中的道教八仙之一。姓“钟离”，名权，字云房。京兆咸阳(今属陕西)人。全真道尊为“正阳祖师”和“北五祖”之一。并谓王玄甫授以赤符玉篆、金科灵文、大丹秘诀，周天火候、青龙剑法。刘操，又名刘海蟾，五代时道士。字昭远，又字宗成，以号行。燕山(今北京市宛平)人。事燕主刘守光为丞相。后弃官隐于华山、终南山。元世祖封为“明悟弘道真君”。

太原昊天观，在太原市西南23公里龙山之上。其建筑已毁，仅存石窟，称“龙山石窟”。由元代初叶著名道士宋德芳主持开凿。宋德芳(1183—1247)，字广道，号披云。莱州掖县(今山东掖县)人。幼从刘处玄为道士，继师事邱处机，好儒道经典，涉猎子史。元太祖十八年(1220)为随邱处机西游十八人之一。太宗九年(1237)于山西平阳(今临汾)玄都观与李志全及弟子秦志安等校刻道藏。

龙山石窟现存三层八窟(包括明正德年间开凿的一窟)，即一窟虚皇龕，造道祖老子像；二窟三清龕，造太清、玉清、上清三清像；三窟卧如龕，传为披云子卧化像，实为卧式练气功像；四窟玄真龕；五窟三天大法师龕；六窟七真龕，为道教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及其弟子丹阳真人马珏，长真真人谭处端，长生真人刘处玄、长春真人邱处机、玉阳真人王处一、广宁真人郝大通的造像。七、八两窟统称辩道龕，八窟也称三皇洞，内塑三皇像。八龕共40余尊雕像，大都保存完好。

“三皇”有六种说法，一是天皇、地皇、泰皇；二是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；三是伏羲、女娲、神农；四是伏羲、神农、祝融；五是伏羲、神农、共工；六是燧人、伏羲、神农。道教主要采用第二说。这样，三皇龕雕塑的应是天皇、地皇、人皇。

汾阳太符观，位于汾阳市杏花镇上庙村。创建年代不详，金承安五年(1200)创建醮坛，明清均有重修。现存为三进院落，中轴线上有山门、正殿，东西两侧有配殿。正殿(昊天殿)为观内主殿，金代遗构，面阔、进深各三间，平面近方形，单檐歇山顶，柱头斗拱五铺作。殿内主像塑玉皇大帝，左右有侍女、天官像6尊。两山及北壁绘道教题材的工笔重彩

壁画97平方米。西配殿为五岳殿，塑五岳大帝及侍者、四渎等彩塑19尊，两山为五岳出巡回归题材的悬塑。东配殿为后土圣母殿，神坛及两山墙下有彩塑36尊，为八圣母及侍女像，并有道教题材壁画87平方米。太符观62尊彩塑和184平方米壁画，均为明代艺术珍品，是研究山西道教的珍贵实物资料。

玉皇大帝，道教天神，全称为“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大帝”，亦称“玄穹高上玉皇大帝”，简称“玉皇大帝”或“玉帝”。据《玉皇本行集经》记载，为光严妙乐国王子，舍弃王位，于普明香严山中学道修真，辅国救民，度化众生，历时三千二百劫后，始证金仙，号“清净自然觉王如来”。又经亿劫，始证玉皇。传说为总执天道最崇高之神，如人间皇帝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(1015)封“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”。宋徽宗政和六年(1116)又加封“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大帝”。

浮山清微观、武乡会仙观、高平清梦观、长治县玉皇观、平遥清虚观等，均为山西现存金元时期的重要道观，分别奉祀太上老君、玉皇、三清、吕祖等神祇。

三清，有两种解释。第一种解释是指三清天、三清境，即三十六天中仅次于大罗天的最高天界，是神仙所居的最高仙境。三清天，一为清微天玉清境；二为禹余天上清境；三为大赤天太清境，简称玉清、上清、太清，是道教崇奉的最高神。第二种解释是三尊神，即居于清微天玉清境的元始天尊（亦称天宝君）、居于禹余天上清境的灵宝天尊（亦称太上道君）、居于大赤天太清境的道德天尊（亦称太上老君）。这种

神主三天三仙境，为三洞教主。又有“一气化三清”之说，谓“三清”皆为元始天尊的化身。

道教是多神教，崇奉的神灵很多，天神地祇、人鬼等无所不包。东汉五斗米道尊奉天、地、水三官，带有浓厚的原始自然崇拜色彩。魏晋时期，道教各派假托神的名义撰写经书，所奉尊神十分混乱，并将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也纳入道教创世神话之中。南朝梁开始对道教各派神仙整合成一个有层阶秩序的系统，“三清”的地位开始确立。唐代特别崇拜老子（对老子的崇拜，从汉代已开始），道教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。宋代特别崇奉玉皇大帝，由原来位居“三清”之下的四位天帝之一，一跃而为“三清”之上主宰宇宙的大帝。道教还把日月五星、二十八宿诸星、北斗星等也奉为神明。特别对斗星的信仰，在中国十分普遍。

山西现存金元时期被道教奉祀的各种神庙，主要有五岳庙、玉皇庙、三峻庙、后土圣母庙、三王庙（牛王、马王、药王）、三官庙、三郎庙、昭泽王（灵泽王）庙、三皇庙、龙王庙等。

汾阳五岳庙，现存两处，一处 在阳城乡虞城村，主殿为金代建筑；另一处在三泉镇北榆苑村，为元代建筑。虞城村五岳庙现存正殿及戏台、西厢房、西耳房。正殿为金代遗构，面阔三间，进深五架椽，单檐硬山顶，斗拱五铺作单下昂。北榆苑五岳庙现存五岳殿、水仙殿为元代建筑，两殿一字形布局。圣母殿、龙王殿、戏台为清代建筑。五岳殿元大德七年（1303）地震毁坏，大德十年（1306）重建。面阔、进深各三间，单檐悬山顶，斗拱四铺作。殿内四壁及两山绘有元代壁画 40 平方米，工笔重彩，立粉贴金，艺术价值较高。水仙殿建于元大德六年（1302），

平面方形，单檐悬山顶，斗拱四铺作。殿内两墙下绘元代工笔重彩壁画，东壁为《水仙出行图》，西壁为《水仙回归图》。并有画工落款，是研究元代壁画的重要史料。

五岳，亦作“嶽”。传说群神所居。五岳之名始于汉武帝，汉宣帝确定五岳为：东岳泰山、西岳华山、北岳恒山（河北）、南岳天柱山（安徽）、中岳嵩山。其后改南岳为湖南衡山。唐玄宗封五岳为王，宋真宗封五岳为帝，明太祖尊五岳为神。从明代开始，北岳恒山移祀浑源。道教崇奉五岳，每岳皆有岳神：东岳“天齐王”，南岳“司天王”，西岳“金天王”，北岳“安天王”，中岳“中天王”。各领仙官玉女几万人，治理其地。

五岳之首的东岳大帝，各地普遍奉祀。为什么独祀东岳大帝呢？因为他掌管人间生死，奉祀他，以祈求平安。至今在晋城市的泽州、阳城、陵川；临汾市的蒲县、翼城；运城市的盐湖区、夏县；长治市的壶关；吕梁市的石楼等地仍保存有金元时期的东岳庙11处，均被列入省保和国保单位。泽州县3处，即高都东岳庙，天齐殿为金大定十八年（1185）、二十九年（1189）重建，面阔三间，进深六椽，单檐歇山顶，柱头斗拱五铺作双下昂。殿内天齐大帝及侍者彩塑为清代重妆。另有重檐十字歇山顶钟楼一座，他处不多见。周村东岳庙，正殿为庙内主体建筑，面阔、进深各三间，平面近方形，单檐歇山顶，柱头斗拱四铺作。柱头结构与斗拱形制仍保留了元代建筑风格。

阳城县1处，即屯城东岳庙。正殿为金代遗构，面阔三间，进深六椽，单檐悬山顶，斗拱六铺作单抄双下昂。

陵川县1处，即玉泉东岳庙。正殿为金代建筑，面阔三

间，进深六椽，单檐歇山顶，斗拱四铺作。

蒲县1处，即县城东2.5公里柏山山巅东岳庙。该庙依地势修建，规模宏大，气势磅礴，建筑自山腰至山巅南北布列，共有殿宇、亭台、楼阁三百余间，高低错落，主次有致。庙四周满山柏树，风景十分宜人。行宫大殿为主体建筑，元代遗构，面阔、进深各五间，重檐歇山顶，上下檐均施斗拱。殿内供奉东岳大帝黄飞虎塑像。其次，位于行宫大殿前的献亭四根盘龙石柱及石雕柱础十分引人注目。前两根石柱为元代所雕，后两根为明代补造。四个石雕柱础为金泰和六年（1206）五月蒲县郭下村石匠李霖雕造，础盘四角雕宝相花（宝相花最早出现于唐代），覆盆上各雕行龙三条，或“龙串富贵”，或“龙串流云”，或“龙跃海涛”，鱼、虾、龟、花卉等相间其上，雕工精细，造型优美，是宋金时期罕见的珍品。另外，该庙最北端保存有一组完整的地狱塑像，为他处少见。

翼城南捍东岳庙（元）、盐湖区郭村泰山庙（元）、夏县大洋村泰山庙（元）、壶关秦庄东岳庙（元）、石楼东兴垣东岳庙（金）等五处东岳庙，均为山西省现存金元时期重要的道教建筑。

东岳大帝，道教所奉泰山神，为五岳之尊。唐玄宗时封为“天齐王”；宋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封为“仁圣天齐王”；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）封为“东岳天齐仁圣大帝”；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）封为“东岳天齐大生仁皇帝”。《云笈七签·五岳真形图序》：“东岳泰山君领群神5900人，主治死生，百鬼之主帅也。血食庙祀所宗者也”。每年夏历三月二十八为祭祀日。

泽州玉皇庙，在晋城市区东北 13 公里府城村，是山西省现存规模最大的玉皇庙。庙内元塑二十八宿，是山西元代彩塑最精华之作。庙坐北朝南，三进院落，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头道山门、二道山门、成汤殿、献亭、玉皇殿。东西两侧为配殿。两庑的二十八宿殿、十二辰殿、十三曜星殿、关帝殿、蚕神殿及厢房、钟鼓楼等，共计殿宇一百余间。

根据庙内现存元至元三十一年(1294)《玉皇庙功德碑》记载，二十八宿彩塑为元代作品，功德主为黄头王秀、赵庄王整等 29 人。以人物和动物形象结合而出现的二十八宿像，全国现存道教宫观中仅此一处。二十八宿作为星座和方位，与日、月、五行或动物之义、属性毫不相关，但作者凭借这些被道教奉作神灵的星座，化抽象为具体，把动物和人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创造出一系列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。在塑造技巧上，采用了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手法，取得了形神兼备的效果。二十八宿星君塑像的杰出成就，还体现了它在雕塑艺术上的高超水平。女性脸庞的细嫩柔软，老年肌肤的干瘪松驰，武士筋骨的劲健刚强，都表现的十分成功。

二十八宿彩塑是把与真人等身的泥塑像配以二十八种动物，创造出道教崇奉的神祇。

二十八宿诸星是道教的重要星神。道教称，北斗落死，南斗上生，东斗主算，西斗记名，中斗总括，监管下界生灵。二十八宿与四方之神的信仰深有关系。道教把二十八宿分别与四方之神配置，成为四方之神的护卫神，发显示主神的八面威风。

青龙是东方之神，在左。二十八宿中角、亢、氐、心、箕、

尾七宿排列状似龙形，按照古代五方配五行和五色的说法，东方属木，其色青，与青龙配置。

白虎是西方之神，在右。二十八宿中奎、娄、胃、昂、毕、觜、参七宿排列似虎形，西方属金，其色白，与白虎配置。

朱雀是南方之神，在前。二十八宿中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张、翼、轸七宿排列状如鸟，南方属火，其色赤，与朱雀配置。

玄武是北方之神，在后。二十八宿中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七宿排列似龟形，或龟蛇合体，北方属水，其色玄（黑），与玄武配置。

平顺九天圣母庙，在县城西 15 公里北社乡东河村。主体建筑为宋代遗物，面阔三间，进深六椽，单檐歇山顶，斗拱五铺作。

九天玄女，亦称“元女”、“玄女”、“九天娘娘”。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，后为道教所信奉。《玄笈七签·九天玄女传》《黄帝内传》等记载，“人头鸟身”，黄帝之师，圣母元君弟子。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时，玄女下降，以六壬、遁甲、兵符、图策、印剑等物授予黄帝，并为制夔牛鼓八十面，遂破蚩尤。又《墨子·非攻》记载，夏禹奉天之命，攻打有苗族，有“人面鸟身”神人助战，“苗师大乱”。又赵超《式穹窿顶墓室与覆斗形墓志》（《文物》1999 年第 5 期）一文中说，“人首（面）鸟身”像，是鲜卑拓跋人中流行过的象征雷、电、山、川的天神像。也是中国古代“千秋”、“万岁”人面神鸟。晋代葛洪《抱朴子·内篇》卷三：“千岁之鸟，万岁之禽，皆人面而鸟身，寿亦如其名”。洛阳金谷园新莽墓中壁画上的“东方句芒图”，也把“句芒”（东方之神）画成人面鸟身的形象。

“人面鸟身”属于有翼神兽，据有关专家研究，它出现于春秋中晚期，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艺术的重要主题。这类神像多发现于黄河流域的甘、陕、晋、冀四省。同时，中国的有翼神兽既受外来影响，又与中国的艺术主题长期共存，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。

上党地区保存有金元时期被道教奉祀的三峻庙、二仙庙、崔府君庙、昭泽王（灵泽王）庙，而山西其他地区则不见。

三峻庙分布在壶关、平顺、高平等市县。该庙奉祀的什么神祇？据碑刻记载，“三峻”原为夏代的侯国，被商灭。其封地在襄垣、屯留交界的三峻山一带，故名“三峻”。后被道教尊奉为神。相传“三峻”神能兴电伤稼，危害百姓。当地在奉祀商汤的同时，也奉祀“三峻”神，以消灾。宋代加封为“护国灵贶王”。明洪武以后，每年农历二月、六月、八月祭祀。清代府以六月六日、县以五月一日、七月七日奉祀。壶关南阳护村三峻庙正殿、高平三王村三峻庙正殿、平顺北社村三峻庙大殿，均为金元时期遗构，殿内塑像都以不存（1947年太行区曾开展过一次“打神像”运动，多数寺庙彩塑被毁之不存）。

壶关神郊村真泽二仙宫、陵川西溪、小会、石圪峦二仙庙、高平西李门二仙庙，泽州湖婁、南村二仙庙，均为宋、金、元时期的神庙建筑。“二仙”的传说在当地家喻户晓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们虔诚地到庙内祭祀他们心中永远怀念的“二仙”。壶关是“二仙”的祖庙，其他都是她们的行宫。所谓“二仙”，是姐妹二人，在当地有十分生动的传说故事。据传她们姓乐，祖籍屯留，后迁居壶关。生母早逝，后妈对她们虐

待，不仅不给吃穿，还经常打骂，逼她们每天到地里挖野菜（苦苦菜）。她们边挖野菜边痛哭其生亲，时间长了，眼泪都哭干了，眼里流出的是血，血滴在了苦菜叶上，渗透到了叶里。至今壶关的苦菜与其他地方的不一样，叶片上有红点，说是姐妹二人的血。“二仙”的传说，感动了当地的百姓，于是建庙奉祀。据壶关真泽二仙宫宋政和元年（1111）《乐氏二真人封号碑》记载，宋大观三年（1109）七月天旱，祈祷于真泽祠（即真泽二仙宫），“其应如响”。于是当地百姓请封仙号。政和元年（1111）四月敕封二女真人之号，姐姐为“冲惠”，妹妹为“冲淑”。在真泽祠东南樱桃掌，传说有“二仙”父母之墓，墓内原有唐乾宁元年（894）石碣。由此推断，“二仙”应为唐代末期人。

崔府君庙在陵川、沁水一带有遗存。陵川崔府君庙在礼义镇，又名“显应王”庙。庙始建于唐，金大定二十四年（1184）重建。现存山门为金代遗构，是山西现存最早的一座山门。崔府君为何许人也？有两种说法。一说姓崔，名珏，字元靖，乐平（今山西昔阳）人。唐贞观进士，为长子县令，因有功德于潞地（今长治一带），建庙祀之。另一说为祁州（今河北无极县）鼓城人。父母祈祷于北岳而生。唐贞观举孝廉，任磁州滏阳（今河北滏阳县）令，昼理阳，夜理阴。一日，与杨叟奕罢，见黄衣人执符对其说：“上帝命以玉珪、玉带、冠衣，召赴五岳”。于是，带卫兵百余人，奏《箫韶》之乐，又取白马至五岳。府君命人取纸笔，遂书一“白”字以逝，世传为白字碑。安禄山叛乱，唐玄宗梦见府君，对其说：“驾勿别往，安禄山必灭矣”。评定安禄山叛乱之后，唐玄宗由四川回到长安，

封崔府君为“显神护国嘉应侯”。唐武宗时,天下大水,祷之即止,封“护国感应公”。贞宗时封“护国真济王”。

潞城东邑村龙王庙、汾阳堡城寺村龙王庙,是山西现存较早的龙王庙。潞城龙王庙大殿为金代建筑,平面呈正方形,单檐悬山顶,斗拱五铺作。汾阳龙王庙正殿为元代遗构,面阔三间,进深四椽,前廊式单檐悬山顶,斗拱四铺作单下昂。

龙王,传说中司兴云降雨之神。佛教中有,道教中也有诸天龙王、四海龙王、五方龙王等,尊元始天尊、上太大道君旨意,领施雨、安坟之事。如遇天旱或遭水灾,诵经召龙王,即可普降大雨,或者雨停止。安置先人坟墓犯了“天星地禁”,诵经请龙王,即可去灾致福。

新绛县城内现存有创建于元至正元年(1341)的三官庙。庙坐东朝西,现存正殿与献殿,两殿相连。献殿面阔一间,进深两间,平面呈方形,十字歇山顶。正殿面阔两间,进深三间,单檐悬山顶。梁架结构前檐设大额枋,檐下无柱,补间斗拱四铺作单下昂。殿内彩塑15尊,皆沥粉贴金,是目前国内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元代三官塑像。

三官,即天官、地官、水官。亦称“三元”,道教所奉之神。传说天官赐福,地官赦罪,水官解厄。后道教又以三官配三元,谓上元天官正月十五日生,中元地官七月十五日生,下元水官十月十五日生。“三元”有六种说法:一是指“三官”;二是指天、地、水;三是指日、月、星;四是指上中下三丹田;五是指精、气、神;六是指六十甲子配九宫,一百八十年为一周始。

汾西县现存有元、明、清时期的真武祠。所谓真武，也称“玄武”，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。《楚辞远游补注》：“玄武谓龟、蛇，位在北方，故曰玄；身有鳞甲，故曰武。”李贤注《后汉书》译为龟蛇合体，故以龟蛇象之。道教常以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作护卫神，以壮威仪。后又加附会，说黄帝时，玄武托胎净乐国善胜皇后，产母左胁。长而勇猛，不统王，得玉清圣祖紫元君传授无极之道，命其赴太和山修炼，久而得道飞升，玉帝册封为玄武。太和山即因此更名为武当山，取非玄武不足以当之之意。宋真宗因避所尊圣祖赵玄朗讳，改玄武为真武。大中祥符年间尊为“镇天真武灵应祐圣帝君”，简称“真武帝君”。其像披发，黑衣，仗剑，踏龟蛇。从者执黑旗。

二、明清道教建筑

中国道教自元中后期开始衰落，到明清约 500 余年间没有多大发展。有的维持现状，有的自生自灭。这一时期山西现存的主要道教建筑有恒山建筑群、广灵水神堂、太原纯阳宫、洪洞碧霞圣母宫、净石宫、代县赵杲观、河曲岱岳庙、介休后土庙、东岳庙、平遥南神庙、万荣后土庙、夏县圣母庙、河津玄帝庙、真武庙、高禰庙、汾阳后土圣母庙、离石凤山道院（天贞观）、柳林玉虚宫、黑龙庙、中阳龙泉观、阳城白龙庙、陵川南庙宫、长治县东泰山庙、“天下第一城隍庙”、襄垣五龙庙等。

恒山建筑群，又称北岳，自明代开始，由河北曲阳移祭

北岳于此(实际清顺治时才正式在此祭北岳)。其主峰位于浑源县境内,海拔2016.8米,叠嶂拔峙,气势雄伟,被称为“人天北柱”、“绝塞名山”。据传,东汉这里就出现了道教活动,祠庙建筑林立。位于飞石窟内的恒山旧主庙,始建于北魏,后经唐、金、元重修,到明、清恒山已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古建筑群,仅主峰就有大小祠庙60余处,即所谓“三寺四祠七亭阁,七宫八洞十五庙”。但多数惜以不存,现仅存明清时期的朝殿、寝宫、梳妆楼、纯阳宫、飞石窟、会仙府等20余处。朝殿又称元灵宫、恒宗殿,为恒山主庙,是恒山最大的庙宇,位于恒宗峰半山腰内壁下,背依山崖,面临深谷。朝殿为一组大庙群,除主殿外,还有崇灵门、青龙殿、白虎殿、南天门、钟鼓楼、藏经楼、更衣楼等,占地2800平方米。朝殿建于明弘治十四年(1502),面阔五间,进深四间,单檐歇山顶。殿内神台塑北岳大帝像,两侧配以文臣、武将。神台上方悬挂康熙御书“化垂悠久”木匾。

寝宫,位于飞石窟内,创建于北魏太延元年(435),为北岳正殿的前身,俗称旧岳庙。唐、金、元重修,明弘治十四年(1502)重建,改称寝宫,是恒山最古老的庙宇。依山而筑,面阔三间,进深两间,重檐歇山顶。

梳妆楼,也在飞石窟内,为寝宫的配殿,清代遗构。平面近方形,重檐歇山顶。

会仙府,又名集仙洞,位于恒宗殿(朝殿)西北高处会仙崖石窟内。据传,会仙府是恒山最早居住仙人的地方。两侧崖壁上布满了宋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名人赞颂恒山雄姿的摩崖题刻。会仙府依崖而建,面阔三间,进深两间,出檐深远,简洁

大方。殿内塑仙人像27尊，中为福、禄、寿三星君，两侧和两壁上为上八洞、中下洞、下八洞共24位神仙，表情各异，神采不凡。其中有人们熟知的八仙神像。八仙，传说中的道教八位神仙，即铁拐李、钟离权、张果老、何仙姑、蓝采和、吕洞宾、韩湘子、曹国舅。八仙故事多见于唐、宋、元、明文人们的记载。唐代已有《八仙图》与《八仙传》。元杂剧更有他们的形象。但宋、元时八仙姓名尚未固定，如永乐宫壁画中的八仙就没有何仙姑。明吴元泰《八仙出处东游记》始确定为以上八人。民间传说有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，常作为文艺作品题材，以《八仙庆寿》《八仙过海》的故事流传最广。“蜀中八仙”和唐代的“饮中八仙”，皆另有所指，非此八仙。

北岳大帝，宋代封“安天元圣帝”。奉祀谁？有三种说法。一种是“黑帝颛顼之所治”。（《礼道要鉴》。）第二种为晨山嵒，即洞渊无极真君。明改封北岳神。（《五岳真形图》）。第三种为崔英被灶神张奎杀死后，封为北岳神。

广灵水神堂，在县城南1公里壶山上，四面环水，风景十分优美。水神堂是丰水神祠和大士庵的合称，因建在壶山上，又名水神堂。水神堂坐北朝南，总平面呈八角形，边长各不相等，现存建筑有圣母殿、禅房、文昌阁、山门、钟鼓楼、配房、老君殿、砖塔等。

水神，为三官之一，专司解厄。文昌帝君，亦称“文曲星”、“文星”。中国古代对斗魁（即魁星）之上六星的总称。古代星相家认为它是吉星，主大贵。后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、禄位的神。元仁宗延祐三年（1316）封梓潼神为“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”，文昌与梓潼遂合二为一，称“文昌帝君”。

旧时士人多崇祀之，以为可保功名。“梓潼”，晋人，传说姓张，名亚子或恶子，居蜀七曲山。唐玄宗、僖宗奔蜀，传说得其护佑，封为“济顺王”。宋真宗咸平年间（998—1003）封“英显武烈王”。宋、元道士假托梓潼降笔作《清河内传》，谓其生于周初，后经七十三化，西晋末方降生四川为张亚子，并称玉皇大帝命他掌管文昌府和人间禄籍。元仁宗延祐三年（1316）与文昌星合二为一，成立主宰天下文教之神，士人多立祠祀之。

太原纯阳宫，位于五一广场西北侧，俗名吕祖庙，奉祀“北五祖”之一吕洞宾。宫坐北朝南，四进院落，中轴依次有宫门、四柱三楼木牌坊、道德门、吕祖殿、方形单间回廊亭与巍阁，四周为配房及砖券窑洞。单体建筑规模虽然都不算大，但布局紧凑，高低错落有致，曲折回旋，组合巧妙，虽为一座道观，却又具有园林建筑的特色。传说建于宋、元之际，元代全真道邱处机的弟子宋德芳曾主持过此宫。明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晋藩王朱新、朱邦祚等人曾在旧址上做过大规模的重修或扩建。清嘉庆年间（1796—1820），由道士高炼昌主持，又在后院窑洞上筑巍阁三层。现存建筑大多为明清遗构。

洪洞碧霞圣母宫，在广胜寺镇坊堆村。创建于明嘉靖二年（1523）。二进四合院布局，中轴线上有木牌坊、圣母殿，两侧仅存西厢房三间。圣母殿面阔三间，进深三间，单檐歇山顶，柱头斗拱七踩。殿内凹字形神坛上塑圣母像，两侧塑宫女及侍者，两山及后墙为悬塑，明代作品。

碧霞圣母，即碧霞元君，道教所奉之神。传说为东岳大

帝之女，宋真宗时封为“天仙玉女碧霞元君”。道教称元君乃应九炁(气)以生，受玉帝之命，证位天仙，统摄岳府神兵，照察人间善恶。有的认为不是东岳大帝之女，是黄帝建岱岳观时，曾遣七女中修而得仙者。

代县西南 23 公里天台山环抱之中有一处很奇特的道观——赵杲观，是代县有名的风景名胜区。赵杲观原为一座佛家寺院，叫“天台寺”。根据清光绪六年(1880)《代州志》记载，创建于北魏。赵杲观何时与佛寺合一，已不可考。但现在虽然叫赵杲观，住的都是僧众，还有远至东北来的僧人。现存建筑为明成化、万历年间(1465—1619)重修。分南、北两洞。南洞名“自在庵”，利用天然石窟，内塑观音及十八罗汉、观音老母救八难石刻画像(共 8 卦)。北洞正殿三间，硬山顶。殿内塑三世佛。左右朵殿及东西配殿各三间，硬山顶。东侧依山建五层楼阁，名“朝阳洞”。下三层建在半山腰，下悬 20 米高的铁索可以攀登。这三层后依山洞，前筑木构建筑。中层塑关帝像，上层塑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。上两层也依石洞建殿三间，塑九仙女。箭阁外塑赵杲像。

赵杲何人？直至明代前期都弄不清是何向之臣。明万历十一年(1583)《重修仙观碑记》推测是当地人，为“汉世之贤相”。除了赵杲，据传说与赵杲同到天台山的，还有一个叫“曾孙”的仙女。推测归推测，但还不等于是定论。20 世纪 80 年代，当地开发旅游资源，赵杲其人有了新的说法。有人认为，赵杲应是春秋末期赵襄子灭代时，代王手下的一位近臣。据说在周元王元年(前 475)，赵襄子于夏屋山(即今代县雁门关附近草垛山)诱杀了代王并攻占代地，代王夫人(赵

襄子姐)在绝望之际也用发笄自杀身亡。就在此时,赵杲引护代王的其他姬妾外逃,落脚于天台山之中,也就成为后来赵杲观的缘启与发端。杨晓国不同意这种说法,认为是“毫无根据的子虚乌有瞎说”。在他所著的《山西名山漫话》(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,2002年第1版)中,根据《隋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,考证赵杲应是隋炀帝杨广幼子杨杲,封“赵王”。后人以讹传讹,杨杲变成了“赵杲”。史称,大业十一年(615)八月,隋炀帝在天池汾阳宫(今宁武县境)避完暑,接着巡塞北,这时突厥始毕可汗突然率数十万兵马袭击而来,炀帝慌忙之中带着车驾随从逃“入雁门,齐王暕以后军保崞县。癸酉,突厥围雁门,上下惶怖,撤民屋为守御之具,城中兵民十五万口,食仅可支二旬,雁门四十一城,突厥克其三十九,惟雁门、崞不下。突厥急攻雁门,矢及御前,上大惧,抱赵王杲而泣,目尽肿”。隋炀帝脱险后,极有可能派大臣带小儿子赵杲去天台山礼神敬佛,以谢神灵佑驾之功。甚至更可能以赵王杲的名义在天台山建寺观,以作永世之祀。至于“曾孩”,也不一定是什么仙女,很可能是赵杲本人。因为隋代宫廷中有称皇子为“孩”的习惯。例如隋炀帝的次子齐王暕就被他的父母称作“阿孩”。

高禰庙,在河津市阳村乡连伯村。庙坐北朝南,中轴线现存山门、戏楼、穿香亭、献殿、正殿。东西有配殿,东塑九郎神,西奉三义神。还有东西厢房20余间。庙内中祭高禰,左祝后稷,左典大禹,是一座具有较高历史、艺术价值的古建筑。

高禰为何神?《后汉书·礼仪志上》记载:“仲春之月立高禰祠于城南,祀以特性。”传说有一天帝尝之妻简狄侍奉

帝啻于台上，有玄鸟（即飞燕）飞过“堕其卵”，简狄吞而食之，因生契（商汤）。“古时必立郊禊焉，玄鸟至之日，以太牢祀于郊禊。天子亲往，后妃帅九嫔御乃礼，天子……授以弓矢于郊禊之前”。“玄鸟至时，阴阳中万物生，故于是以三牲（大祀）请子于高禊神后明显之处，故谓之禊。因其求子，故谓之禊”。“汉武帝晚得太子，始立高禊之祠。高禊者，人之先也，故立石为主祀以大牢（大祀）”。

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，“高禊”原来是只玄鸟，帝啻之妻简狄吃了牠生的蛋，怀胎而生商。根据这个传说，从汉代开始建高禊庙，“祀以大牢”，历代祭祀不衰，以求贵子。高禊庙实际是后土娘娘庙。后稷，据《礼记》记载，夏代衰亡时，周弃（周代人）继承了神农的事业，后人祭祀他，称为稷神。

长治县都城隍庙，位于西火镇南大章村。庙坐北朝南，一进院落，现存山门、戏台、献亭、正殿、夹殿、钟鼓楼、廊房、耳房等殿宇 50 余间。正殿为主体建筑，面阔三间，进深五椽，单檐硬山顶。

为什么叫“都城隍”？相传东汉光武帝刘秀在称帝前遭王莽追杀至此，逃入庙内避灾，许诺若城隍保佑其性命，日后必封此庙为天下都城隍。刘秀登基后，果然降旨封其为“天下都城隍”。

城隍是城市的守护神。“隍”指没有水的护城壕。据传，城隍神是由《周礼》蜡祭八神之一“水庸”演化而来。有了城池，于是就有了城隍神。城隍神的职责最初只是守御城池，保障治安。后来，当地的雨旱丰歉、吉凶祸福、冥间诸事全都归其掌管。城隍神的信仰、崇拜盛行于唐宋，尤以宋为最。宋

代天下的府、州、县几乎都立庙奉祀城隍，并列入祀典。到元代，城隍进而成为国家的守护大神，各级城隍封爵也高了起来。在朝野奉祀城隍形成风气的时候，道教便把他纳入自己的体系，以他为翦恶除凶、护国安邦、旱时降雨、涝时放晴，并管领一方亡魂的神明。

城隍的原型，最初是八蜡中的水庸神，后来则象土地爷、闫王爷，多以正直的名臣死后作城隍。这些城隍爷，生前都以品行或业绩著称于世。由于这些人名声好、本事大，并且又有一定的地方性，威严而亲切，所以被人们奉作保佑一城一都的守护神。

民间对城隍的迷信，概括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住庙祛病，即住在庙里以正压邪，解除疾病；二是审夜堂，即从病人身上审出鬼来，将它逐除；三是镇压灾疫、求雨等。各地城隍的庙会时间不一样，有的每月初一、十五、二十五日开市，百姓杂陈，摊棚林立，十分热闹。城隍庙里的城隍像常有两尊，一尊泥塑，固定不动；一尊木雕，以供出巡。其出巡意在体察冥间之事及人的寿命祸福。

离石凤山道院（天贞观），位于市区北三阳云凤山，为离石标志性建筑。创建于宋，是为祭祀宋代道祖陈希夷（陈抟）和其门徒而建。元代遭兵火焚毁，明洪武、宣德、景泰年间进行过较大维修、扩建。现存建筑分上下两院，依山就势而筑，主要有三清殿、孙真人殿、读书楼、陈抟殿、玉皇楼、雷公殿、三官楼。附属建筑有老爷庙、土地庙、五道庙、石碑坊等。

陈抟殿又称白云洞，是主要建筑之一。面阔三间，进深两间，单檐悬山顶，斗拱七铺作双抄单下昂。其梁架结构保

留了元代建筑风格。殿内现存30余平方米绘于明永乐十一年(1413)《修建武当山宫观感应之图》壁画。壁画上部为“十次神主显现图”，下部为“武当山全景鸟瞰图”。图中亭、台、楼、阁采用沥粉贴金，构图严谨，色泽艳丽，是山西现存明初较好的壁画之一。

陈抟(?—989)，五代、宋初道士，字图南，自号扶摇子。生于唐末，亳州真源(今安徽亳州)人。后唐长兴(930—933)中举士不第，隐居武当山。后移居华山。后周世宗(954—959)好黄白术，显德三年(956)召问其术，命为谏议大夫，固辞不受。好读《易》，手不释卷。宋太宗(976—997)待之甚厚，赐号“希夷先生”。著有《无极图》和《先天图》，认为万物一体，只有超绝万有的“一大理法”存在。

在山西有些县(市)现存有三王庙，是道教尊奉的神祇之一。所谓“三王”，是指牛王、马王、药王。

牛王，也叫牛神、牛王菩萨。其渊源有三种说法，一说是秦代的一颗大树所化，这棵树随砍随合，后来在创口撒石灰后才慢慢砍断。树断以后化为牛，时人便立祠奉其为牛王。二说是孔子的弟子冉伯牛。三说是汉代的渤海太守龚遂为牛王大帝。以上三说均为编造或附会而成。据传，古代农耕无牛，农人怨愤，玉皇大帝即派牛王菩萨下界传旨三日一餐。牛王菩萨体谅民间疾苦，改传圣旨一日三餐，激怒玉帝，贬其下凡，牛王菩萨即请求转生变牛，为百姓位犁。牛王主要为农民所奉祀，据说牠可以保佑牛不染瘟疫。古时所奉牛王为牛首人身像。农历十月初一为诞辰日，届时民间多举行牛王会，对生活中的耕牛以优厚待遇。

马王，同二郎神一样，也长着三只眼睛。俗话说，不给你点厉害，不知马王爷长着三只眼。对马王的信仰、崇拜起源较早，春秋时代就有四时祭马王的仪规，民间养马的人则在仲夏（农历五月）奉祀马王。农历六月二十三为“马王节”。马王像大都是赤面多须，额上竖立一只眼，手持枪械，身披甲冑。神像上题“水草马明王”。阳城县有水草庙，奉祀的是兽医，是给马王、牛王等牲畜看病的。全省仅此一处。

药王是中国民间行业神之一，被道教崇奉。不同时代，不同地区，所尊奉的药王也不同，有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孙思邈、扁鹊、华陀、邳彤（皮场大王）、三韦氏、吕洞宾、李时珍、保生大帝、眼光娘娘、李铁拐等。其中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为上古三皇，被称为“医药之祖”，又称“药皇”。在三位药皇中，神农是最当得起的一位。俗传神农是种植和医药的发明者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：“神农氏尝百草，……一日而遇七十毒”。《史记》也说：“神农氏尝百草，始有医药”。神农氏后因尝药草于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中毒而死，人们就把这一天定为药王的纪念日。在众多药王中，唐代孙思邈和战国时代的扁鹊最著名，四月二十八日以纪念他们二人的为多。八仙中吕洞宾是一个小字辈，但他的传说最多、最著名、影响最广，人们对他的奉祀也最隆重，因此，被尊奉为药王。人们除了焚香祝祷外，还有取吕祖庙香灰的，称“炉药”，俗谓可以包治百病（这是人们在愚昧和贫困之下，寄希望于神灵的一种说法）。《晋祠志》记山西祭药王的风俗时说：“（四月）二十八日，本镇诸医生并各药材店，醵金设脯醴饼饵，致祭药王于三圣祠”。

介休后土庙、汾阳后土圣母庙、万荣后土庙，是山西现存明代著名的三处后土庙。介休后土庙以金碧辉煌的琉璃艺术享誉三晋；汾阳后土圣母庙以精美的明代壁画闻名全省；而万荣后土庙则以历史悠久和所处地位之高而誉满全国。

汾阳后土圣母庙，又名后土庙，亦称神母庙，位于汾阳市西北3公里的田村。明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）重建。现仅存大殿与东耳殿。大殿内明代壁画乃全庙之精华。壁画主要分布在东、西、北三壁，总面积55.46平方米。根据大殿建筑年代与画风判断，为明嘉靖年间（1522—1566）作品。壁画主题为圣母起居图。东壁绘迎驾图，尊贵的圣母在众宫女簇拥下姗姗出宫，龙辇、文官武卫仪仗迎奉。下方绘以表现圣母“降赐子嗣”的内容。画面较多运用暖色，兼以沥粉贴金装饰，烘托出热烈壮观的气氛。北壁绘圣母宫生活场景，宫中人物烧水、奉茶、洗涤，各司其职。奏乐宫女凝神弹奏，姿态如生。亭台楼阁、曲栏山石布列其同，色泽素雅，古韵犹自存。西壁主要表现两个方面的内容，一为出巡行进中的圣母，龙辇奔驰，神将护卫，城隍、土地、水府诸神送驾献宝，山石云气飘逸流动，人物塑造动静结合；二为迎奉圣母回朝时宫中斋供情景。其中殿堂一座，周设勾栏，盘龙云路，朱红色廊柱上设斗拱，托起卷棚式屋顶，檐下悬“圣母娘娘殿”横匾一方。殿内装饰富丽华彩，供桌上陈设着珊瑚、灵芝、牡丹等，侍者恭谦，武者威严，人物表情传神达意，构图层次疏密分明。

介休后土庙，位于介休市城内庙底街。始建于北魏太安三年（457），西魏大统元年（535）重修，宋皇祐元年（1049）敕

修，元大德七年(1303)平阳大地震毁坏，延祐五年(1318)复建，明清屡次重修。

庙坐北朝南，由五进院落组成，中轴线有龙壁、山门、戏楼、钟鼓楼、三清楼、后土殿等，均为明清建筑。三清楼是庙内主体建筑，为二层三檐十字歇山顶。楼下三间奉太清、玉清、上清“三清”塑像。八角形藻井绘刻太极八卦图，故又有“八卦楼”之称。三清楼后楼与乐楼连构一体，左右又有钟鼓楼对峙，黄色琉璃瓦复盖，是一组非常漂亮的楼阁式建筑组群。后土殿明正德十六年(1521)重修，全部复盖黄色琉璃瓦和琉璃构件。

介休后土庙最有特色的是屋顶复盖黄色琉璃瓦，金碧辉煌，是山西现存明清琉璃制品的代表作之一。其中三清楼部分瓦件是宋代琉璃，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琉璃构件之一。乐楼两只琉璃垂兽为明代烧制，其余琉璃为清代重修庙宇时更新，色泽纯正，造型颇佳，均为本地产品。

古代规定，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，民间不得使用。黄色琉璃瓦也只有皇宫建筑及与皇宫有关的皇陵、行宫等其他建筑才可以使用，民间建筑也是禁止使用的。但有两种建筑可以使用，一是后土庙，因为后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母亲，自周代开始，历代君王和皇帝都奉祀后土。二是皇帝颁旨敕建的寺院，如五台山菩萨顶。

万荣后土庙，位于县城西南 40 公里宝鼎乡庙前村，俗称后土祠。这里曾属于历史上著名的汾阴隄(shuì)地，“背汾带河”(在黄河东岸)，依山傍水(汾水)，地势开阔。汉代建汾阴县。

后土,据《国语·鲁语》及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载:“共二代之九省(即九州·全国)也,其正曰后土,能平九土(即九州·全国),故祀以为社。”后土皇祇亦名“承天效法土皇地祇”,道教神明,掌阴阳生育、万物之美与大地山河之秀的女神,称为后土娘娘、后土圣母等。《周礼·大司乐》称“地示”。《礼·月令》称“后土”。从周代开始便以后土为社神祭祀,历代帝王因袭这一传统,为后人祈求人寿年丰,国泰民安。《梁书·武帝纪》称“后地”。《旧唐书·礼仪志》称“皇地祇”。《宋史·徽宗纪》:政和七年(1117)上“地祇”徽号为“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”。南宋吕元素《道门定制》卷二注:“后土即朝廷祀皇地祇于方止(丘)是也。王者所尊。合上帝为天父地母焉”。

万荣后土庙庙址高耸,西、北两面临黄河和汾河。据金天会十五年(1137)《后土庙图碑》显示,原中轴线有山门、太宁庙、承天门、柔坤门、坤柔殿、轩辕扫地坛等;两侧排列着碑楼、五虎殿、真武殿等。庙北附半圆形祭坛区,庙外围为瓦顶宫墙一周。现存后土庙坐北朝南,清同治九年(1870)荣河知县戴儒珍易地重建于北。现存建筑以晚清的作品居多,由南向北中轴线上有山门、戏台、献殿、享亭、圣母殿、秋风楼。献殿两胁为东西五虎殿,圣母殿东侧为碑亭。

后土庙的特色主要在其生动逼真的雕刻艺术。几乎在各个殿宇的柱、斗、梁、雀替等构件上都雕有各异的图案,其中圣母殿雕刻以浓郁的生活气息著称;献殿则以花卉雕刻见长,松、竹、梅、兰多具韵味;戏台前檐半镂空雕饰,行龙、蕙草栩栩如生;秋风楼柱、枋、拱的雕饰,技法不同,风格各

异，艺术造型与建筑本身堪称小木作之精品。

汾阴祭后土，肇自西汉文帝，正式始于武帝。据《前汉书·郊祀志》记载，汉文帝后元元年（前163），一位名叫“平”的大臣说，他望见东北汾阴一直有宝气，可能是出土了周鼎，但是不去迎接而到不了长安。于是，文帝派使臣到汾阴建庙（即历史上的汾阴庙），南临黄河，“欲祠出周鼎”。后有人上书告“平”所言皆诈也。于是，文帝诛杀“平”。“是后文帝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。”

汉武帝十分迷信神鬼，他即位后仅有祭天的地方，而无祭后土的地方，“失对偶之义”。元鼎元年（前116）五月，得鼎汾水之上。于是，汉武帝“定郊祀之礼，祀太一于甘泉，就乾位也（在京西），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（汾水之旁土特堆起，是泽中方丘），汾雎出鼎，皇祐元始（大福也）”。汉武帝所以定汾阴雎上祭后土，一是这里的地貌符合祭后土用方丘的要求，二是更重要的这里出宝鼎，会带来大福的。

元鼎四年（前113）汉武帝“自夏阳（今陕西韩城）东幸汾阴。汾阴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泽，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阴雎上。如宽舒等议，上亲望拜如上帝礼。礼毕，天子遂至荥阳”。六月，又得宝鼎后土祠旁。据《前汉书》记载，此鼎无款识（铭文），后“迺以礼祠迎鼎至甘泉”（即西汉甘泉宫），用以祭天。这是汉武帝第一次到汾阴祭后土，也是汾阴最早开始建立后土祠，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。

汉武帝第一次祭后土，用的是祭天之礼，即大祭。根据唐代依西周和汉代礼仪制定的关于祭后土的仪规，祭后土的时间应是夏至之日（后世定为农历三月十八日）。祭坛应

是方丘(依天圆地方之说)。坛高二层,下层方十丈,上层五丈。地祇与配祭帝王设位于坛上,神州及五岳、四镇、四渎、四海、五方山、林、川、泽、丘陵、愤衍、原隰并皆从祀。神州在坛之第二等;五岳以下三十七座在坛下外壝之内;丘陵等三十座在壝外。用的祭牲:地祇及配帝用犊(小牛)二头(先献血和毛),神州用黝犊一头;四镇以下加羊、猪各五头。祭坛上铺棗桔;祭器用陶匏。祭器包括筩十二、豆十二、簋一、簠一、甑一、俎一。从祭的祭器斟减。“筩”,盛果实、干肉等的竹器;“豆”,盛食物器皿;“簋”盛食物;“簠”,盛谷物;“甑”锅也;“俎”,盛牛、羊等祭品之器具。

祭天用生肉,祭地(后土)用半生不熟的肉,祭小鬼神才用熟肉。祭祀前三个月,要把祭牲(赤色小牛)系在牢中做准备。主祭人汉武帝及太后前七天便开始半斋戒状态,前三天实行严格的斋戒。祭祀那天,汉武帝穿衮衣,象征天;戴冕,冕前端有用玉珠装饰的十二条流苏,这是取法于十二月之数。乘坐没有装饰的车子,取质朴之义。武帝亲自牵着祭牲,儿辈面对面协助,大臣们依次跟随。登祭坛时唱《清庙》诗,坛下管乐吹奏《象》之舞曲,用八列(八佾)舞队跳《大武》或《大夏》之舞。

元封四年(前107),汉武帝再次“自代还幸河东,祠后土”。下诏曰:“朕躬祭后土地祇,见光集于灵坛,一夜三烛。幸中都宫,殿上见光。其赦汾阴、夏阳、中都死罪以下。赐三县及民皆无出今年租税”。

元封六年(前105)三月,汉武帝第三次“行幸河东,祠后土。”下诏曰:“朕礼首山,毗田出珍物,化或为黄金。祭后土,

神光三烛。其赦汾阴殊死以下，赐天下贫民布帛，人一匹。”

太初二年(前103)三月，汉武帝第四次“行幸河东，祠后土。令天下大酺五日。”下诏曰：“联用事介山，祭后土，皆有光应。其赦汾阴、安邑殊死以下”。

天汉元年(前100)三月，汉武帝第五次“行幸河东，祠后土”。

汉武帝从元鼎四年(前113)开始，至天汉元年(前100)的14年中，先后五次亲到汾阴祭后土，可见其对汾阴的重视。他在五次汾阴祭后土中，有感而发，用汉赋形式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秋风辞》：

秋风起兮白云飞，
草木黄落兮雁南归；
兰有秀兮菊有芳，
携佳人兮不能忘；
泛楼船兮济汾河，
横中流兮扬素波；
箫鼓鸣兮发棹歌，
欢乐极兮哀情多；
少壮几时兮奈老何。

万荣后土庙秋风楼三层内，现存有元大德十一年(1307)董若冲刻石的《秋风辞》碑。另在二层有清同治十三年(1874)《汉武帝秋风辞碑》，荣河知事戴儒珍跋，夏县耿荫樾书丹，记《秋风辞碑》没于黄河的几次沉沦。

由长安来汾阴祭后土，有水陆两路。陆路由潼关过河，经现在的芮城、永济、临猗到汾阴。水路由潼关乘船，由黄河

逆水而上到汾阴。从《秋风辞》中的“泛楼船兮济汾河，横中流兮扬素波”辞句推测，武帝可能是乘船到汾阴的。

神爵元年(前61)三月，汉宣帝“行幸河东，祠后土。”诏曰：“东济大河，天气清静，神鱼舞河，幸万岁宫，神爵翔集，其以五年为神爵元年……”并制诏太帝，凡大的江海百川，现在没有祭祀的，从今以后命祠官每年都要祭祀，“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。”

五凤三年(前55)三月，汉宣帝二次“行幸河东，祠后土”。

初元四年(前45)三月，汉元帝“行幸河东，祠后土。赦汾阴徒”。

永始四年(前13)，汉成帝“行幸河东，祠后土。”又元延二年(前11)三月，“行幸河东，祠后土。因游龙门，登历观”。又元延四年(前9)，“行幸河东，祠后土”。又绥和二年(前7)三月，“行幸河东，祠后土”。汉成帝前后四次来汾阴祭后土，是继武帝之后，西汉在汾阴祭后土最多的帝王。据《前汉书》记载，汉成帝建始元年(前32)祭后土已移至长安北郊。但20年后，成帝仍来汾阴祭后土。汉哀帝建平三年(前4)仍恢复汾阴祭后土。此后不久，根据校尉刘歆等67人的提议，又复长安北郊祭后土。

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八年(42)三月，“幸蒲坂，祠后土。”“祭地于河东汾阴后土宫，宫曲入河，古之祭地，泽中方丘也。以夏至日祭，其礼如祭天。”(刘秀建武中元二年，东汉祭后土定在了京城北郊)。

与东晋并存的前秦永兴二年(358)六月，秦主苻坚“如

河东，祀后土”。

唐玄宗李隆基开元“十一年正月……，己巳如并州……，庚辰次潞州……，辛卯次并州，改并州为北都。……二月……壬子如汾阴，祠后土，赐文武官阶勋爵帛。……三月辛未至自汾阴免所过今岁税，赦京城。”又据光绪版《山西通志》记载，这次唐玄宗汾阴祭后土，“获宝鼎，因改汾阴县为宝鼎县”。

开元二十年(732)，唐玄宗二次来汾阴祭后土。先到潞州(今长治)，后到太原，于“庚申如汾阴，祀后土。大赦，免供顿州今岁税，赐文武官阶勋爵，诸州侍老帛。武德以来功臣后及唐隆功臣三品以上一子官，民脯三日。十二月辛未至自汾阴”。

唐武德初年，已定长安北14华里为祭后土之方丘，但唐玄宗为什么还来汾阴祭后土？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他曾任过潞州别驾，有一种怀旧感。第二个原因太原是李家王朝的发迹地，有瞻仰先祖之意。这两次祭后土都是先到太原或潞州，顺便行幸汾阴的，不是专门来祭后土。

开元二十一年(733)八月，唐玄宗御制并书《后土神祠碑铭》，记开元十一年(723)他第一次祀汾阴后土。同年由肖嵩书的《后土神祠碑阴》，记玄宗第二次祀汾阴后土。这通碑原在荣河(今属万荣县)，现已不存。

北宋初年已定在京城汴京之北14华里祭后土，但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四年(1011)却来汾阴祭后土，而且是历史上汾阴祀后土规模最大的一次。据《宋史·礼志一》记载，大中祥符三年(1010)六月河中府进士薛南及父老僧道一千二百

人上书宋真宗，“请亲祠后土”。宋真宗下诏未允准。继而薛南再次请求，河南尹、宁王元偓亦表请文武百官“诸东上閤门三表以请”。最后宋真宗下诏，同意明年（大中祥符四年）亲祭汾阴后土。命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祀汾阴经度制置（总管），翰林学士李宗谔副之。枢密直学士戚纶、昭宣使刘承珪计度发运；河北转运使李士衡、盐铁副使林特计度粮草；龙图阁待制王曙、西京左藏库使张景宗、供备库使兰继宗，修治行宫、道路。宰臣王旦为大礼，知枢密院王钦若为礼仪，参知政事冯拯为仪仗，赵安仁为卤簿，陈尧叟为桥道顿递，又以旦为天书仪卫，钦若安仁副之，丁谓、兰继宗为扶侍，都监内侍周怀政、皇甫继明为夹侍。发陕西、河东兵五千人赴汾阴。命翰林、礼院详定仪注，造玉册、祭器。祭前七日，先令陈尧叟到后土祠告祭河中府境内伏羲、神农、帝舜、成汤、周文武、汉文帝、周公庙。在脰下，先祭汉、唐六帝，以及告天地、庙社、岳镇、海渚等。派人到脰上筑祭坛，“其方丘之制八角三成（层），每等高四尺，上阔十六步。八陛（阶），上陛广八尺，中广一丈，下广一丈二尺。三重墼，四面开门。为瘞坎于坛之壬地外墼之内，方深取足。”正坐（后土）备玉册、玉匱各一副，配坐（宋太祖、宋太宗）备玉册、金匱两副。关于玉册、玉（金）匱的规格尺寸、包装及如何给坎内瘞埋等，都有详尽的规定。祭祀前，皇帝要举行斋戒，散斋四日，致斋三日。

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）正月，“帝司仪于崇德殿，丁酉法驾发京师。二月丙辰至宝鼎县（现万荣县）奉祇宫。戊午致斋。……庚申百官宿祀所。是夜一鼓，扶持使奉天书，升玉辂。先至脰上。二鼓，帝承（乘）金辂法驾诣（到）坛，夹路设

燎火，盘道回曲，周以黄摩仗。初路出庙南，帝以未修谒不欲乘輿辇过其前，令凿路由庙后至坛次。翌日，帝服袞冕，登坛祀后土地祇，备三献，奉天书于神坐之左，次以太祖、太宗配侑（书）册。文曰（以下读祭文，略）。……帝还次改服通天冠，绛纱袍，乘輦谒（拜）后土庙，设登歌奠献遣官，分奠诸神。至庭中，亲所封石匱，还奉祇宫。……是日诏改奉祇宫曰太宁宫。壬戌，御朝覲坛，受朝贺，大赦天下。文武官并迁秩、叙封。建宝鼎县为庆成军。赐天下大脯三日。宴群臣于穆清殿，父老于宫门。穆清殿，奉祇宫之前殿也。诏五使从臣刻名碑阴。”宋真宗汾阴祭后土，从离开京城，到祀典结束，前后25天左右，在汾阴驻蹕6天左右。最后祀西岳庙后，返回汴京。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汾阴祭后土，为以后留下深远影响。特别是他御制御书和篆额的著名的《汾阴二圣配飨铭》（俗称“萧墙碑”），把宋太祖赵匡胤、宋太宗赵光义二圣也配于后土祠中。故以后对庙宇大加修饰，现存庙内金刻《后土庙图碑》，可窥见宋金时后土庙的盛况。

《汾阴二圣配飨铭》碑，无碑座，由五方碑石拼成。碑身高2.52米，通宽7.14米。曾淹没于黄河泥砂中，1962年发掘出土，现嵌于后土庙东廊壁间。在碑的前面，原有铁人4尊，高6尺，铸于宋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），是宋真宗汾阴祭后土时作焚炉之具用的。明代晚期，当地人认为铁人能镇黄河水灾，故移至西门外黄河一侧镇之，现已不存。其次，宋真宗汾阴祭后土的当年，在后土庙立有两通纪念碑刻，一通为《祀汾阴坛颂》，王文贞公旦撰文，尹熙古书。原在大宁殿后。另一通为《汾阴朝覲坛颂》，王钦若撰文。原在朝覲坛。现这

两通碑均已不存。

另外，历史上在汾阴曾出土过两件与汾阴有直接关系的铜鼎，现均下落不明。

（一）《汾阴侯鼎》。出土于陕西户县民家井中。鼎小似陪鼎。铭文“汾阴侯”三字。有薰烧痕迹，说明使用过。汾阴侯是汉御史大夫周昌，卒谥悼侯。

（二）《汾阴宫鼎》。盖铭 15 字：“汾阴共官铜鼎盖十十枚，重二斤八两。”（“十十”为二十，是鼎的编号）。器铭 37 字：“汾阴共官铜鼎十十枚，容一斗，重十斤。汾阴宫铜鼎一，容一斗，重十斤。第二十三”。有人考定，此鼎是汉代祀汾阴后土官用器。

三、道教文化源远流长

中国道教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，是社会改良思潮的一面旗帜，产生过《太平经》这样的经典。同时，它又不断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，壮大自己，发挥自己的影响和作用。道教在产生、发展和壮大自己的过程中，创造了底蕴很深而璀璨的道教文化，这些文化几乎渗透历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思想、艺术（音乐、舞蹈、诗歌、书法、绘画、戏曲）、建筑、医药、科技等各个领域。有很多道教活动相沿成习，慢慢转化为民间风俗，代代相传，延续至今。也有许多至今仍在各个方面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。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，对中国各个领域，各个层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，了解一点道

教文化,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,可以启迪我们思考和认识更多的社会现象,可以以古鉴今,从中吸取先进文化的养分。

(一)道教提倡炼丹,把中国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出现的金属冶炼技术、秦汉之际出现的炼丹术,以及传统医学理论等,都成为道教服食金丹成仙不死思想的主要来源。而道教也对这些科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。比如历代道士中不少人为了寻找炼丹的原材料,走遍名山大川,对大量矿物、植物等进行实地考察,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记录,至今仍为医药、冶炼等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(二)道教把中国神话传说作为自己思想的源泉之一。同时,大量道教作品本身也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宝库,还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,促进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。如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封神演义》《红楼梦》等古典名著中,都能看到道教文化的影响痕迹。道教的八仙传说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,成为生动的民间故事和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之一。此外,在戏曲、舞蹈、音乐、美术、建筑和造像艺术、绘画、书法等方面,道教思想文化的印痕也随处可见。

(三)金元以后占北方统治地位的全真道,其宗旨要求个人内修“真功”,外修“真行”。真功,就是所谓“明心见性”、“除情去欲”。真行,就是所谓“忍耻含垢,苦己利人”。永乐宫现存《吕仙翁百字碑》,是吕洞宾修炼真功的座右铭:

本性好清静,保养心猿定;

洒又何曾饭,色欲已罢尽;

财又我不贪,气又我不竞;

见者如不见，听者如不听；
莫论它人非，只寻自己病；
官中不系名，私下凭信行；
遇有不轻狂，如无守本分；
不在人彀中，免却心头闷；
和光且同尘，但把俗情混；
因甚不争名，曾共高人论；

九峰纯阳上宫刻石

《全唐诗》中，有吕洞宾《养生诗》11首，内容丰富，涉及到养生的各个方面，同《百字碑》一样都是修身养性的理论基础。首先，养生的重点是修心养生。“有人问我修行法，只种心里养此身。”种心，即加强思想道德修养，养德才能养生。一个思想境界高尚的人，不动邪念，不作恶事，精神上是坦然的，心胸也是舒畅的。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健康十项标准中的“心理健全”方面，与道教的“种心”理论，即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是一致的。我们现在养生只注重躯体健康，而忽视心理健康的互联关系。其实，心因性养生比身因性养生更有重要意义。心情的作用，感情的威力，对健康长寿至关重要，吕洞宾在养生诗中首先注意到了。其次，养生诗强调自己的努力实践。“忠孝义慈行方便，不需求我自然真”。“命要传，性要悟，入圣超凡由汝做”。说明修命的功法传给你，就要靠自己修炼；修性的道理讲给你，就要靠自己领悟。第三，对钱财、功名利禄，都应看的很淡薄。不要随便在背后议论别人的是是非非，应多寻找自己的缺点毛病。不要只凭官府中的人际关系作靠山而成名或升迁发财，要凭自己的诚信去行

事,保持一个良心的心态。第四,强调相信科学,不要迷信。吕洞宾提出: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;“养气忘言守,降心为不为”,反对乞神弄鬼、算命占卦的迷信活动;反对“闭门引气”、“头上安头”一类的旁门左道,强调自我营卫阴阳,修炼自身的精、气、神。吕洞宾这些理论和实践是科学的,在中国传统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上,都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(四)道教在频繁地祭祀各种神祇的活动中,遵循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。这些制度从商周开始形成,经历朝历代不断补充完善,使其逐步成为完整体系,是我国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。有许多礼仪至今仍在延用或借鉴。

作为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,使人们处于一种和谐状态的“礼”,产生于国家和阶级出现之后,而在“大同”社会则是不需要“礼”的。这是“礼”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。就如同我们现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一样,“礼”在当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,调和社会矛盾曾起过积极的作用。有了“礼”,才能“以正君臣,以笃父子,以睦兄弟,以和夫妇,以设制度,以立田里,以资勇知(智)”。“礼”的产生,除有历史根源外,还有人性根源。《礼运》认为,人生有“七情六欲”,如不加以约束,就容易“感于物而动”,造成“强者胁弱,众者暴寡,知(智)者诈愚,勇者苦怯,疾病不养,老弱孤独,不得其所”的社会混乱现象。

《礼记》认为,要治理社会,平治天下,除了循礼,还要用乐。《乐记》中说:“乐者,天地之和也。”乐是人感于物而产生的内在感情的表现,是各种音的和谐组合,是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。“乐行而伦清,耳目聪明,血气和平,移风易俗,天下

皆宁”。乐与礼一柔一刚，共同促进社会与国家安定和谐。礼以规行，乐以治心。治理国家者，在重视礼的同时，还要重视乐，要礼乐并行，只有这样，君臣、上下、父子、父妇、朋友才能各安其位，而又圆融和谐，且天地沂合，阴阳相得，草木茂盛，一切井然有序，天下大治。因此，用礼乐来进行祭祀，是治国之本。

（五）中国道教有它辉煌的一面，也有走向衰落的深刻教训。全真道自金代创立到元代前期，在创始人王重阳及后继的教主邱处机等人士主持下，教风十分简朴刻苦。开始道士们都不建宫观，大多靠四处乞讨度日，过着苦行僧的生活，从行为和思想上都没有“忘本”，没有脱离基层广大的信教群众。比如王重阳七弟子之一马钰，每天只讨食一钵面，四季赤脚走路，夏天不喝水，冬天不烤火。王处一曾经在砂石中跪到膝盖磨烂露出骨头，赤脚登山，人称“铁脚”。邱处机每天只讨吃一次饭，潜心修道。全真道在他们的带领下，发展迅速，到元代初期达到兴盛时期。但随着元代统治者对全真道的“宠爱”，地位的不断提高，以及对上层人物优厚的待遇，使他们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。他们长期居住京华，脱离广大教徒，生活奢侈，腐败滋生，到元代中后期，即开始走下坡路，全盛时期极其短暂，仅仅七、八十年。如果从金大定七年（1167）全真道创立，到元中后期开始衰落，也只不过120年左右。全真道过早的衰落，在中国道教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，从思想方面也给我们以某种历史的警示。